

陕甘宁边区生产合作运动研究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军民, 通过生产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 以及移民垦荒, 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 成功解决了粮食问题, 为支援抗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粮食工作; 生产运动; 合作运动; 移民垦荒

doi: 10.3969/j.issn.1008-3928.2014.01.015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928(2014)02-0066-07

史学界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 对陕甘宁边区农业、粮食工作、合作运动的研究多有所涉及。^① 笔者注意到, 粮食问题的解决与边区农业生产息息相关, 事实上成为边区农业生产的中心线索。笔者不揣浅陋, 拟以粮食问题为契机, 对陕甘宁边区生产和合作运动的成就做综合研究, 以期增加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陕甘宁边区粮食工作

1. 粮食的征集

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征集工作, 以临时农业税性质的救国公粮为主要渠道。1937 年 10 月 1 日抗战开始后边区即颁布征收救国公粮条例, 规定“以每年秋收后每人平均实际收获量为征收计算标准。但缴纳时, 应以家为单位, 将全家人口应缴数量, 合并缴纳。”征收额根据人均收获量累进, 每人年不满 300 斤者免收, 300 至 450 斤者收 1%, 累进至 1500 斤者收 5%。但是特别规定靠出租土地作为生活来源的地主, 即使 300 斤以下也要征收 1%, 以上则要

加倍征收, 而佃户减半征收。公粮以区为单位征收, 由缴纳人送至区政府指定地点。^{[1]36-37} 随条例附发的细则规定, 公粮以谷子为标准粮, 其他粮食均应折合为谷子。但是公粮只征收麦子、糜子、包谷、谷子和荞麦。^{[1]43}

1941 年的救国公粮条例对征收范围做了科学规定。首先, 对人地分离现象, 条例规定“凡人在边区, 资产收入在边区以外者, 征收公粮完全采取属人主义。凡资产收入在边区, 人在边区以外者, 征收公粮完全采取属地主义。”旨在杜绝恶意逃避税收的现象。其次, 确定公粮征收范围为“以耕种所得之一切农作物; 以出租土地或耕牛所得之租金或租粟。”从而将地主和富农的租佃收入纳入征收范围。最后, 条例通过“凡租佃土地或租牛务农者, 计算收益时须除去地租或牛租”, 从而照顾了贫农和佃农的经济利益。此次征收还确定起征额为每口 150 斤。^{[1]280-282} 边区党和政府一方面要求 1941 年征粮最高额不能超过农户收入的 30%, 强调“必须有党组织与领导上的保证, 各地征粮征草数额, 必须经各

收稿日期: 2014-01-07

作者简介: 王明前(1971-), 男, 江苏苏州人,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基金项目: 厦门大学 985 工程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项目。

县各乡参议会村民大会民主决定”,党组织要做到“每个干部每个成员报粮实在,纳粮纳草在前”;^{[2]122-123}另一方面确定 1941 年救国公粮工作的重点是扩大负担面,通过执行每口 5 斗起征,使 80% 以上的百姓都负担了公粮任务。同时通过限制累进税率,防止极端民主和向大户集中的现象。^{[2]129}结果,延属各县占到 85% 到 96%,但绥德分区起征点降为 3 斗,陇东分区以麦子 5 斗起征,仍使贫农利益受到损害。而延属各县还有将最高税率提高到 50% 以上,导致影响地主富农生产情绪的现象。^{[2]140}

但是,救国公粮作为农业税,存在一定的不足。救国公粮以农业收入为依据,忽视财产状况,缺乏科学性,因此在 1942 年后逐渐向统一农业累进税转化。尽管如此,救国公粮对边区粮食的征集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历史功绩值得肯定。

2. 粮食的保管

边区政府设立专门职能机构管理粮食工作。1943 年 12 月 14 日,边区政府命令各分区专署设粮食科管理该分区粮食工作。^{[3]393}县政府第五科为粮食工作职能部门,“掌理粮食之收支、仓库管理、调剂民食等事项”^{[4]132}。1942 年边区设立县务委员会,规定“必要时得设粮食股,直接归县务委员会领导”^{[4]214}。

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粮食保管工作,要求“各级仓库以便利交通,及工作之督导或直属粮食局,或隶属各分区专署及各县政府”^{[1]296}。粮食收支逐渐规范化,各仓库逐渐把旧式收支日记帐簿改为新式帐簿。在粮食支付的预计算方面,计算有单据,会计有清楚的收支数字。^{[5]325}边区政府采纳参议员杨正甲等的建议和关中义仓的经验,命令各级政府“积极劝导人民创建义仓,积蓄余粮,以备万一”^{[6]341}。为坚决打击地主富农靠借粮剥削贫农和外来移民的现象,边区政府考虑设立备荒仓,“青黄不接时没饭吃的人,可向备荒仓借谷,秋收归还,只取点子消耗的息,每石五升至多一斗”。同时考虑办粮食调剂局平抑粮价,并提倡私人储粮,向群众宣传储粮比储货币好的道理。^{[1]116}边区政府为稳定粮食市场,打击奸商操纵粮价,成立平糶处专门负责粮食调剂工作。平糶处“由粮食局呈请财政厅出资办理,概不收民股”,为官办性质。但人民自愿办理平糶事业,可得到平糶处采买和运输上的帮助。^{[1]298}边区政府要求各部队加强粮食保管工作。1941 年 12 月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接管一部分政府仓库,

“保证粮食质量好与数量够,按时入仓;由政府动员群众运送入仓”,暂时解决粮仓保管弊端丛生的问题。^{[7]457}

边区政府最初对公粮采取寓粮于民的储藏方法,“征公粮是以区为单位储存着,军队打到哪里吃到哪里”^{[8]123}。1942 年起公粮直接由人民送到各机关保管,一方面保证机关粮食供给,另一方面节省了运力。但同时粮食主管机关和吃粮机关责任加重。对粮食主管机关来说,需做好监督检查粮食保管和指导各机关建立保管与合理使用的制度。对于吃粮机关,应严格执行粮食保管法令,反对违法卖粮现象,普遍建立节省委员会,对工作人员进行节约教育。^{[1]389-390}

二、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运动

1. 优先发展农业政策的确定和生产运动的落实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粮食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粮食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赖自身农业生产的发展。边区高原和山地多被黄土覆盖。黄土颗粒均匀,结构疏松,不易保存水分,但是其中大量碳酸钙物质很容易为植物吸收,具备一定农业生产条件。边区最肥沃的土地为冲积土壤,但多在河畔,数量不多。边区气候为大陆性气候,雨量小,霜期长,不适宜生长期长的农作物种植。边区大致分 4 个农业区:沿黄河的延属东三县延河一带,灌溉条件好,气候温暖,雨量较多,生长期较长,主产棉、麦、谷子;三边区气候干旱,主产糜子、荞麦;关陇区主产冬麦;延绥区主产谷子。^{[8]19-20}总之,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理想。可是,由于陕甘宁边区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大后方,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因此,边区农业生产虽然面临着劳动力不足不均、耕地不足、资本缺乏、专门技术人才缺少和陕北周期性旱灾五大困难,但是边区政府坚决依靠 200 万民众,组织 5 万脱产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展全边区范围的生产运动,通过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实现了粮食自给,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5]191-193}

毛泽东主席高度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他指示全党“我们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生产,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支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作

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战。”^{[9]99}他认为边区农业的发展首先在于纠正左倾错误,“打破了农民怕发展生产的倾向。农民愿意增加耕具,富农敢于安伙子、雇长工。休养生息政策恢复了元气,便利了农民的再生产。同时粮价高,副业利大,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热情。”^{[10]175}他要求“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应鼓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10]181}他指出:“开荒除老户抛熟垦新所开者外,主要靠招集外来移民来开。”他特别敦促“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提高技术与准备实行累进税。”除累进税外,均应在1943年全面实施。^{[10]571}

边区政府把农业作为年度工作重点之一来抓。1939年4月颁布的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4]27}1940年边区建设计划,要求扩大耕地100万亩,在改善耕作方法的基础上提高产量,比上年增加粮食20万石。计划要求修水地至少2万亩。^{[1]104-105}1941年5月1日通过的边区施政纲领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60万亩,增加粮食产量40万石,奖励外来移民。”^{[4]86}1941年边区建设计划,要求农业方面开荒60万亩,每亩产量提高到2升细粮,全边区增产40万石,力争“耕三余一”。^{[1]162}开荒面积逐年增加,1940年为698989亩,1941年411262亩,1942年为354768亩,1943年为763276.8亩。^{[10]573}1941年,边区(除定边、盐池二县)开荒434312亩。^{[1]363}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计划要求“贯彻以农业为主、广泛发展私人经济的政策”,力争增加粮食产量20万石,推广植棉,扩大棉地至15万亩。为此需要继续移民开荒,举办耕牛贷款,实现开荒60万亩,并兴修靖边杨桥畔、鄯县葫芦河、安定杨家园子等处水利工程。^{[1]377}

1943年,边区政府推行按户计划以促进农业生产。所谓按户计划,是根据生产任务,“去作每一农户的计划,使之具体化”。边区政府采取两种方式加以推广。对干部力量足够的地区实施逐户计划,在干部不足的地区采取先找典型再推广的办法。按户计划的制定要求在春耕前完成,并不时检查,督促其落实。^{[5]244-245}在这一计划的推动下,1943年边区

耕地面积由1940年的1174.2082万亩增加到1338.7213万亩,总产量1843万石;原计划增产细粮8万石,实际达到16万石;开春荒97万亩,产量14.5万石;水漫地增产1.5万石。扣除消费162万石,余粮22万石。植棉由1940年的1.5177万亩增加到15.287万亩,净收棉花170万至220万斤,自给率50%以上。^{[4]380-381}部队1943年开荒30.6万亩。其中三五九旅开荒10万亩,收细粮2万石,实现全部自给。^{[4]386}

在1943年成绩的基础上,边区政府要求在1944年继续扩大耕地面积,军民开荒100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增种洋芋30万亩;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保证亩产增加细粮1升,增产10万石。^{[4]396}1944年边区经济建设计划,在农业方面,为保证“耕三余一”两年内完成,需要开荒100万亩,增产细粮至少16万石,增种洋芋30万亩,抵细粮至少24万石。提倡改良农作,争取每亩增产细粮1升,共增产10万石。^{[8]254}

除了鼓励私人农业发展外,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机关和部队的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呼吁“军队生产应当主要放在农业上来”,力争“各旅一定要以相当数目的部队从事屯田,要规定一定数量粮食生产任务”,最好象三五九旅一样订出切实可行的农业生产计划。^{[8]181}为此军队要专门设立负责生产的部门领导生产工作,“从旅到连,按级建立生产委员会,选择政治与工作能力强的干部主管各部门的生产与供给工作。”不仅基层连设生产管理员,营设生产副营长,旅和团设生产副官,而且“各级主官必须亲自计划与检查经济工作,要纠正干部党员中轻视经济工作,不愿做经济工作的倾向。”^{[8]183}各级生产运动委员会领导边区的生产运动,负责生产运动的动员、教育工作和劳动力调剂。^{[5]200}生产运动使经济工作与政治任务相联系,造成全民生产热潮。特别是青年学生在生产运动中“以自古无有的劳动实践锻炼了思想意识与肉体,证明改造自然也同时即改造人性。”^{[5]216}

边区政府重视劳动英雄的积极引导作用,要求“劳动英模主要是领导一村,没有做到领导一村的,必须将他提高到领导一村。”^{[1]496}没有劳动英雄的地方也要得到附近劳动英雄的影响。

2. 季节性生产运动的动员

除了落实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和发动机关部队开展生产运动外,边区政府还通过季节性生产动员

组织群众投入生产运动中。季节性生产动员包括春耕、夏耕和秋收的生产动员。

1937年9月20日,边区发布秋收通令,要求“按时收成,负责保管,不糟蹋一粒粮食;加紧秋耕,多种麦子,多耕熟地,不荒掉一垧荒地;大量开荒。”^{[11]8}

1938年2月边区建设厅拟定春耕工作大纲,要求健全与扩大各种劳动互助组织,“边区各县建立建设委员会,专领导全县春耕整个建设事宜”。大纲还要求做好耕牛种子的补充与调剂工作,动员群众根据土地面积和耕牛数量相互调剂,要求合作社购买新农具供给农民使用,买棉纱麻籽供给农民。大纲尤其强调要领导群众开荒,大量扩大耕地面积,并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引导群众普遍建厕所收集肥料,改良土质,增产粮食。^{[1]47-49}1938年6月边区政府又发起夏耕运动,要求“完成夏秋田的锄地任务,并保证川地锄草三次,山地锄草二次”;其次要集中消灭禾鼠;再次要尽可能施用腐熟的畜尿追肥助长禾苗发育;最后要求夏耕初期应适时多种种植短期作物如糜谷荞麦等,尽可能实行间植,如在玉米地中间种豆类,从而以较小的耕种面积增加产量。同时推动春耕的有延续性的工作如兴修水利等。^{[1]62-63}1938年9月,边区建设厅发布秋收动员令,要求各地配合秋收,大量开荒和兴修水地,并积极多种冬麦。^{[1]70}

1940年9月9日,边区政府发布通令,部署秋收生产,要求各地适当调剂劳动力,事先准备好秋收工具和打谷场,充分选择良种以备来年使用,对已收割的土地要尽量翻耕,动员农户制备条囤木柜贮存粮食,收集肥料建厕所。^{[12]415}

1941年1月29日,边区政府发布春耕运动指示,要求本年春耕运动“要普遍改进农作法,使每亩地平均提高两升细粮的收成”,并开荒60万亩,使全边区增产细粮40万石。^{[13]41}1941年4月11日,边区政府指示各地在春耕时,面对春耕与修路时间冲突的问题,应做到“先集中力量春耕,后修路”^{[7]131}。

1942年春耕工作,要求“不荒芜一亩熟地。必须换掉的熟地,应开生荒补上”。开荒应吸收外来移民,扩大耕地面积,生产中“须广泛进行深耕,多施肥料,选择优良籽种”,并帮助农民做好劳动力和耕牛的调剂。^{[14]236-237}1942年2月发布的春耕工作办法,要求春耕期间“应竭力减少人力和牲口的动员,使农民便于集中力量进行春耕”。开荒工作应多吸收移民,帮助农民进行劳力和耕牛调剂互助。

边区政府还要求各地根据当地情况制定春耕运动的中心工作。如延安、延长、固临夏秋各半,应注意植棉;应改进农作,多施肥;绥德没有荒地,应组织移民到延属县调剂人口,在提高原存耕地产量的基础上多发展副业。^{[1]386-388}1942年5月27日,边区政府发布春耕指示,要求“切实组织农民锄草,做到山地锄二次,川地至少锄三次,以提高粮食产量。”^{[15]178}1942年9月17日边区政府秋收指示信首先要要求力争不误工,并号召机关干部帮助秋收。另外,要对遭受雹灾的耕地,设法改种冬麦以弥补损失。秋收后还需注意调查统计工作,并组织群众尽快翻地。^{[15]349}

1945年5月16日,西北局紧急指示各级党组织做好防旱备荒工作,要求各部队机关学校“多种南瓜萝卜菜蔬,准备下雨时多种小月谷糜子,采集和保存一切可供食用的野菜如艾菜田菜苜蓿谷糠麦麸榆树皮等”。特别是发挥互助合作的优点,打井筑坝兴修水利。同时还要厉行节约,“严禁粮食出境及蒸酒熬糖推粉等糟蹋粮食的现象”^{[1]209}。1945年5月21日,边区政府鉴于旱灾可能到来,重申禁止粮食出口和蒸酒熬糖。^{[16]125}同日又颁布防旱备荒动员令,号召军民一方面尽快干耕干种适宜的庄稼,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河边近水的下湿地带抢种各种蔬菜,尤其是洋芋、南瓜、萝卜以备荒年。最后还要访求老人经验搜集小日月庄稼以便遇雨时赶种。^{[16]128}

三、农业生产中的互助合作运动

合作社运动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取得显著成就。党中央希望陕甘宁边区继续发扬这一光荣传统。毛泽东主席分析道“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由于现时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合作社仍然“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样的合作社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4种形式。毛泽东预言“我们有了人民群众这四种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1]413-415}根据边区政府1941年制定的农业生产互助小组暂行组织条例,生产互助小组“以个体的私有经营为原则,但各组员对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事,应尽量调剂互助”。小组以行政村为1小组,最少由5户组成,向外贷款时,须先自筹资本,然后再向银行借款。自筹资本额,须按生产基础多少

规定比例。^{[10]425}

但实际上,在边区互助合作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对旧有互助形式的改造。在毛主席、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展开。边区政府在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时,强调群众自愿原则,同时尽可能引导农民利用流行的旧有劳动互助形式,因为“利用旧的各种互助形式就最容易为他们所接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凡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就是提高生产,它才是巩固的”。相反,形式主义的抄名单拼凑起来的变工组织是不稳固的。^{[10]517}边区旧有的劳动互助最广泛的是变工,指农户之间相互调剂人力和畜力。此外,扎工和唐将班子也很普遍,是一种集体雇工组织。许多出门找活的雇工组织起来,由于其中不乏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为劳动互助才参加扎工,因此仍然属于劳动互助组织。扎工流行于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延属、三边等地,唐将班子流行于关中产麦区。此外还有兑地或换地,是农民相互调剂土地的方式,分为死兑和活兑两类,多为小农户采用。前者彼此交换所有权,后者只交换使用权。总之,边区旧有的生产互助仍然无法改变个体小农经济的落后面貌。^{[1]477-479}而对旧有劳动合作的改造不仅因时制宜,而且可以立即见效。旧有的劳动互助方式多具有自发组织、短期性和不固定的特点,新的互助有向长期、固定发展的趋势。过去变工只限于本族亲友之间,新的劳动互助势必要打破狭小的宗族圈;旧有变工形式之所以不能扩大,是因为组织涣散和劳动纪律不严格,新变工一般须要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从而可以保持较大规模。特别是,新变工不再局限于一定的农业劳作上,而是扩展到更广阔的劳动领域。^{[1]462-467}

变工自1942年高干会后为边区党和政府所积极倡导,成为边区农业生产的一项重大改革。变工有多种形式。第一种为有牛犍和劳动力的变工队,集体劳动集体吃饭,秋收时按劳动力分配粮食;第二种有劳动力而没有牛犍,各人自带干粮,开荒时集体吃饭,秋收时按劳动力分配粮食。以上两种形式适用于有大块公荒可供农民自由开垦的地方。第三种有劳动力,或集体吃饭和开荒,按劳动力分配粮食;或各家吃饭,每天轮流开荒,所开荒地,收入归己;或给谁开荒,就吃谁家饭,收获归谁。这是适合没有大块公荒的地少人稠地区。在地少人稠的绥德、米脂,还流行临时性的“活变”,多在锄草和秋收时采用。

此外,还有长期的变工,或并地,由几家土地不足的贫农合并土地耕种,抽出一两人外出打短工,赚钱按地多少分配;或抽牲口,把闲下的劳动力和牲口抽出赶脚户做买卖,按集体劳动,收获按地分粮,赚钱按劳力畜力分。另外,还有轮流种地和雇佣两种。^{[10]465-466}变工极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如延安变工,每人7天可开荒一垧,不变工则需10天。变工在锄草运粪时效率更高,如淳耀集体接力运粪8个工350驮,个体送则需要23个工。开荒时变工也成效显著,如合水县变工前一个多月开荒10653亩,变工后12天就开13700亩。^{[10]493}个体农民参加变工也经济实惠。如定边二区四乡贺家园村的贺保之,1942年种400亩,花费1000元工资,打粮89.6石;1943年种550亩,不花费工资,打粮112石。^{[10]495}

变工队能否巩固,除党的领导正确和劳动英雄的示范作用外,还应看是否符合农业生产的规律。首先,变工队应契合农时组织和调整。按庄稼需要,锄草时先锄草大的,收割时先收成熟的。还要贯彻革命的群众路线,实行先贫后富,先小户再大户的原则。议价时要做到贫富兼顾和季节区别议价的原则。其次,变工队的巩固与否还应看是否适应自然条件。“春耕可用较大的队形,而下种锄草与收割则应分散成小组;耕地大,则应集中小组为大队,耕地小,又应分散为小组;关中平原地种麦须用牛力,班子就须分散,而山坡上种秋,不用牛力,需大批人力,则须集中成大班。”最后,严格的劳动纪律能够有效减少集体和个人矛盾的发生。纪律是“出于群众自愿,并作用为互相戒免的公约的话”^{[10]527-529}。要巩固变工,党的领导至为关键。“农村支部和党员在组织变工队上,应成为变工队的核心。”^{[10]537}如延川县参加变工扎工的2340人中,党员占803人,变工扎工负责人又占半数。

劳动互助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它使分散保守的农民敢于采用新式农作方法和新技术,还能刺激和带动更多的未参加生产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投入生产运动中。^{[10]501}互助合作还使农民在节省劳动力的前提下,实行精耕细作,并有余粮发展副业。如华池县劳动英雄张振财参加变工后,在开荒200亩外比上年多翻地1次,多锄草1次,还抽出牲口外出运盐2次。再如米脂七里庙的模范变工队,在1944年夏耘90%的地能锄4次,而往年只能锄3次。21头耕驴,可抽出7头到米脂等地驮炭,每次净赚150元,另省出10个劳动力在变工之余打短工,290天

共盈利 27000 元。^{[10]503-505}米脂罗家坪村的木工厂就是由变工后余出的劳动力开办的,一年可盈利 6 万元。^{[10]511}劳动互助可以节省劳动力,如三边分区 1945 年春耕,变工每天节省 2006 个工,一个月就节省 60180 个工。^{[10]501}劳动互助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如延安县吴家枣园村 1942 年收获 141 石 5 斗,1943 年为 256 石 7 斗 5 升,增加 81%。安塞马家沟村 1942 年为 83 石 7 斗,1943 年增加 86%,达到 160 石。^{[10]487}

边区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显著成就。1938 年春耕运动期间,劳动互助组织扩大,有 181640 人,占 30%。特别是组织妇女劳动力 39750 人,劳动组织互相调剂耕牛、农具、籽种,使耕地面积扩大,开荒 358480 亩。^{[10]61}到 1943 年,全边区 338760 个全劳动力中,参加合作社的有 81128 个,占 24%。^{[4]384}1945 年参加变工的劳动力,一个地区多的占 45%,少的占 28%,锄草时有的县占到劳动力的 80%。^{[10]434}

四、移难民垦荒政策的实施

边区移民垦荒工作是提高农业生产、调剂边区劳动力配置的重要措施。毛泽东主席亲自布置移民工作,他指示“由绥米警备区党政组织五千个劳动力的移民向直属各县开荒;但须在自愿原则下,并进行各方面的宣传组织工作。”他要求移民输入地的党组织做好移民准备和优待工作。“政府准备部分粮食借给必须帮助的移民,另外酌予农具贷款,并切实实行免征三年公粮的优待办法。”^{[10]630}同时要发动老户帮助移民安家或供粮、借窑洞,或吸收伙种。毛泽东还指出解决移难民生产困难的办法首先是要确定产权。“公荒谁开归谁;私荒本人不开,让难民开,三年不出租子,以资鼓励。”另外要老户帮助移难民,如“吃粮在农民中进行调剂。今年提出春前借一斗,秋后还一斗三升,有三分的利,鼓励老户借粮,政府保证归还。”还可以发动老户与难民调分子、安庄稼等互助合作。政府要主动举办农具贷款,解决移难民开荒所需。为吸引更多移难民,毛泽东建议“发动难民利用社会关系去找人来”^{[10]664-665}。

边区移民的现实性在于边区人口和耕地分配存在很大差别。绥德分区只有耕地 1209702 亩,但是人口高达 512071 人,人均仅 2 亩多。以劳动力计算,绥德有全劳动力 106795 个、半劳动力 34819 个,合计 124205 个全劳动力,劳动力人均耕地只有 9 亩半。以边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一个全劳动力至少可耕 15 亩土地,再加畜力至少可耕 30 亩,因此绥德分

区有 1/3 即 4 万劳动力可以移出。相比之下,延属 7 县有荒地 158 万亩,需要开荒劳动力 15 万个。陇东、关中、三边的荒地不比延安少。因此,开展边区内部的移民工作,实现资源的充分配置,显得十分必要。^{[10]634-635}

边区政府 1940 年的经济计划,要求吸收外来难民和贫民到边区来。该计划敦促各地必须克服“不愿将多余的荒地分给难民使用,而让地主富农残酷的去剥削难民贫农”的倾向,纠正“强迫劳动服役”的错误做法。^{[1]107}1941 年计划投资 10 万元作为补助移民购买工具籽种及食粮之用。^{[1]162}边区对参加垦荒的移难民给予政策优待,规定“经移难民自力开垦和雇人开垦之公荒,其土地所有权概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纳地租,三年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凡移难民在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种子,或缺乏食粮者,得由县政府呈请边区政府优先予以农贷之帮助。”^{[4]260-261}1943 年 6 月 24 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地为移难民垦荒工作作好准备。“首先是巩固已经移进的移难民,并经过他们写信或派人号召。”各地应调查可垦荒地的数目,估计可容纳移民数量,报告给边区政府,以便政府制定移民计划。^{[4]322}

1942 年高干会后,移民工作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阶段。1941 年移入居民 8527 户 27240 人,为边区外或绥德米脂向延安、安塞、甘泉一带垦殖的难民,以延安移民最多。安塞专门成立移民乡,乡长及乡政府由移民选举产生。^{[10]66-67}1942 年上半年移民 4843 户 11325 人。为帮助移难民解决生活生产困难,延安、安塞、甘泉等 7 县共调剂粮食 841.7 石,延安等 12 县调剂耕牛 3906 头,延安等 5 县调剂农具 1895 件,延安等 11 县调剂种子 140.6 石,延安等 13 县调剂土地 35189 亩。^{[10]70}到 1943 年,通过优待移难民政策,边区增加劳动力 8800 余人。如关中区每一劳动力开荒 7.9 亩,便开荒 38774.7 亩。^{[4]383}延安县 1937 年有 7703 户 33705 人,1942 年增加到 16446 户 64292 人,其中增加的 8473 户有 8009 户是移难民,增加的 31587 人有 29704 人为移难民。延安县专门划出川口、柳林、金盆三个区为移民区,在川口市沟划出一个移民乡。为帮助移难民解决生活生产困难,延安县 1940 至 1942 年共动员老户调剂粮食 1623.38 石,由政府担保 3 分利息。县政府

1940年专门拨款25000元帮助移难民解决农具问题,1941、1942两年追加到数十万元。县政府还动员老户调剂洋芋籽13555斤给移难民种植。^{[10]668-670}

移民垦荒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从1941年到1943年6万多移难民约18300个劳动力,以人均耕地20亩计,可扩大耕地面积36.6万亩,产粮7.32万石。^{[10]643-644}由于边区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移入地人民的帮助,移难民一般一年基本解决衣食,两三年便可独立经营。^{[10]648}“发展最慢的,也能饱食暖衣,变成了自耕农,至于那些发展快的,则上升为富农。”^{[10]652}更重大的意义是扩大了240多万亩耕地,其中200万亩是靠移难民的力量开荒增加的。

综上所述,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军民,通过生产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以及移民垦荒,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成功解决了粮食问题,为支援抗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注释:

- ① 相关研究参见: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 [1]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 [2]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3]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

件选编:第七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4]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 [5]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 [6]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八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7]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四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8]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9]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10]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11]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 [1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二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 [13]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 [14]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15]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 [16]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九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张明海)